

媒介素养：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推动力

秦艳华 杜洁

[摘要] 数字时代，乡村公共结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等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发生改变和重构，乡村的媒介环境亦变得更为复杂，表现为资本驱使下的乡村文化异化，村落文化“脱域化”发展加大基层治理难度，乡村文化向心力、凝聚力趋于淡化，媒介信息逐渐沦为消费主义的工具，乡土文化生产传播陷入“信息茧房”等。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必然要面对农民对于媒介化生活环境的应对问题。农民媒介素养直接关系到乡村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乡村文明社会的构建与治理，因而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只有不断提升农民的媒介素养，才能更好推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 数字媒介 媒介素养 乡村文化振兴 网络文明 乡村振兴

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我国乡村形成了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交互软件为支撑的信息传播网络体系，使乡村公共结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等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发生改变和重构。乡村居民的思维习惯、价值取向、精神需求等也呈现新的、鲜明的时代特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必然要面对农民对于媒介化生活环境的应对问题，也就是农民的媒介素养问题。农民媒介素养是农民选择、理解、质疑、评估，以及制作、传播媒介信息能力的体现，直接关系到乡村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利用、乡村文明社会的构建与治理。农民媒介素养能力的提升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新技术催生新媒介，带来新体验并使人们享受其中的同时，受众也不得不面对新技术和新媒介的消极一面——信息的指数级增长对人们思考耐性的消磨，网络社群的集体情绪对人们现实理性的掩盖，等等。当农民面对这样复杂的网络环境时，对于信息价值很难作出正确的预估和判断，也就难以避免受到负面信息的侵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只有不断提升农民的媒介素养，才能更好地推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战略目标。

一、提升农民媒介素养的现实意义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与应用，越来越多的农民在网上宣传家乡风貌、推销农副产品、推广乡村建设经验，承担起利用新媒体传承乡土文化、繁荣乡村经济的重要使命。大力提升农民媒介素养，对于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加快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发挥农民基层文化建设主体作用

尽管长久以来以血缘和地缘为代表的乡土情结在乡村共同体的维护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在数字时代，数字赋能的现代化乡村建设越来越体现出减少城市与农村之间结构性差异的不可替代性。大量的乡村达人、农民网红在互联网上出现，他们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兴的传播方式向外界介绍自己的生活状况、展示乡村的自然风貌，销售乡村的美食特产，既发挥了乡村文化传播的主体作用，又搭建了受众关注“三农”问题的新渠道，起到了农村与外界沟通交流的中介作用，成为国家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借助新媒体的力量，立足“本土化资源”，是建设美丽乡村、弘扬农耕文明的重要手段。农民媒介素养的提升，可以使农民不断提高应对数

字化乡村变革的能力,能够更好地挖掘、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培育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各类产业。农民自觉主动地参与数字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大潮中,对于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中活跃于网络的“新乡贤”“新农人”,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领军人物,也是乡村公共话语的意见领袖。发挥好“新乡贤”“新农人”的引领作用,不仅可以激励农民利用新技术、新媒体提高生产、生活水平的积极性,还可以在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实现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

(二) 有助于促进乡村公共文化功能再造

乡村公共文化再造是现代化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指标,是乡村提升生产生活质量的重要抓手,也是新时代“三农”政策的主要切入点。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设备、交互式传播形态改变了农民以亲疏远近关系为基础的传播圈层,形成了以“三农”主题为传播原点、以互联网信息平台为社交中介的开放性、交互式传播关系。媒介化转向中的新兴“三农”文化模式显现出蓬勃的发展活力。通过提升农民的媒介素养,激发农民学习新技术、运用新媒介的热情,可以帮助他们在数字化的浪潮中立足本土,站稳脚跟,在传播乡村文化、参与乡村经济的社会实践中,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把现代生活和乡土情怀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乡村公共文化的数字化再造。在农村城镇化、数字化、现代化的趋势下,农民媒介素养不仅要适应媒介化社会环境的需要,也要在维护乡村发展、传播村落文化、实现乡村振兴方面起到重要保障作用。因而,提高农民媒介素养既是培育现代农民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乡村公共文化功能再造的重要途径。

(三) 有助于推动国家文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随着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农民的流动性逐渐增强,这为加强我国基层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被打破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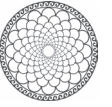
后,尤其是数字化社会的到来,农民的身份认同陷入新的危机。各种各样的新兴媒介快速发展,扩大了农民信息交流的范围,人与人的交往空间和场景也发生了数字化位移。201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把完善国家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基层文化制度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作为国家文化治理的战略目标。乡镇政府、基层文化站、村民委员代表是国家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化浪潮席卷农村,复杂的信息环境带来了农民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为加强和完善基层文化建设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提高农民媒介素养,引导农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自觉将新媒体环境下自身的生产生活行为准则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制度高度契合,强化主人翁意识,充分融入基层文化建设之中,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不断提高,这对于完善国家文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数字化时代农民媒介素养的缺失现状

长期以来,以慢节奏、原生态为标志的乡村作为与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生产生活空间,似乎与网络化、信息化、互动性的数字生活“格格不入”,而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的耦合重塑了乡村的信息传播结构,乡村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面对庞杂的信息资源,农民对数字信息的筛选能力、判断能力、应对能力、制作能力以及创新传播能力等都存在不足,农民的媒介素养水平还不能适应信息的变化速度和复杂程度。

(一) 资本驱使下的乡村文化异化

数字技术加速了虚拟空间的交往与互动,体现了媒介技术在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推动作用。在现代化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它代表了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呈现,同时也意味着



改善乡村经济、满足农民利益诉求的政策趋向。这种经济诉求建立在一定的社会认可和基本道德的基础之上，若是超出了社会容忍程度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就会导致乡村文化资源的利益失衡。以乡村达人的直播带货为例，互联网从供给侧方面实现了农民利益的线上转移，为农产品的线上销售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但同时网络直播平台也形成了类封闭式的空间环境，供给侧的技术赋能反而促进了封闭空间的能量溢价^[1]。这种溢价容易迷失农民对本土资源的正面认知，造成因对乡土资源的错误判断而形成的文化异化，以至于可能失去公众对乡土文化的正面评价。

（二）村落文化“脱域化”发展加大基层治理难度

乡村公共事务处理能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数字化技术在乡村的普及程度还不相适应。加之，传统社会农耕文明的维系依靠的是长久以来基于村民代际传递形成的以生产生活经验、道德规范、思想观念为代表的宗法文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渗透，传统村民之间的互动空间逐渐从以土地为纽带的区域空间中剥离出来，形成“脱域化”的文化现象，村民之间的沟通交流脱离了地缘和血缘的情感关系而被重构^[2]，由此带来的是乡村社会公共服务的难度升级。在网络空间中，农民通过网络互动交流参与乡村事务，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成为现代乡村建设的重要指标，乡村文化开启媒介化转向，社区公共性的外延被不断扩大，形成一张巨大的融合网络。此时的乡村服务不再是集中性的群体活动，而是被拆解为无数个网络节点，农民彼此联结却又相互区隔。在技术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双重冲击下，村落文化“脱域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传统礼俗秩序的话语权威占有较大比重的乡村基层治理规范逐渐式微，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基层治理带来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三）乡村文化向心力、凝聚力趋于淡化

乡村集体化的生活实践具有仪式性，它起

着联结农民关系，整合乡村社会、促进人际交流的重要作用，并且作为一种传播中介深嵌于乡村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随着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的普及，更多的农民成为交互媒体的忠实用户。微信、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的传播形态使传统的乡村传播结构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网络交流在为农民的沟通交流带来便捷的同时，维系农民情感的亲缘、地缘关系却随着身体“在场”的减少而不断淡化，最后加剧了乡村离散，使农民淡化了对农村文化的向心力。虚拟空间的交流与沟通互动反衬出现实生活的情感凋敝和乡村离散，乡村文化振兴的活力在虚拟空间的互动中被不断消耗，乡土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被网络社群所取代，看似容纳万民狂欢的网络社群反而加剧了农民在现实世界的孤独感。

（四）媒介信息逐渐沦为消费主义的工具

数字技术的进步以及逐渐降低的进入门槛为更多农民成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便捷，他们可以轻松地掌握视频化、去中心化、碎片化的新技术，自如地传输信息内容。新一代的网络社群突破了现实中的社群聚合形式，形成了以陌生人为主体、传输内容为共通点的内容平台，并且吸引了大批具有相同爱好的网络用户，他们的互动交流更加便捷迅速，高清的影像传输更是弥合了前台与后台、虚拟与现实的界限。移动技术的快速传输让用户缩减了思考的时间，未经深思熟虑的内容信息生产越发具有指向性，侧重市场收益，追求点赞、转发频率成为他们的目标。这虽然为农民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经济利益，却使得部分农民的信息生产陷入利益追逐的制作怪圈。用户浏览媒介信息也不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通过阅读其异化的“乡村生活符号”满足猎奇心理。美食、美景、乡民个体成为用户眼中机械化生产的娱乐符号，丧失了乡村文化传播的本意。

（五）乡土文化生产传播陷入“信息茧房”

目前，网络上传播的有关乡村的视频看似

丰富多彩,但细分起来,只是限于农产品直播带货、乡村特色美食制作、农村生活展现等题材,且内容雷同。大数据分析系统的应用对农民用户画像日渐精准,但算法推送范围的窄化导致“信息茧房”效应明显。农民的“个性化需求”演变为算法技术操控下的“工具性诉求”,农民信息获取与分享的自主权力在算法的技术逻辑下被源源不断的同质化消息所遮盖。大量丰富的、有利于乡村经济发展的农民致富知识、积极健康向上的乡土文化因个体权力的式微和推动技术的限制无法进入农民的信息视野。具体表现为,不论是农产品直播带货、乡村特色美食制作、农村生活展示,还是其他乡村题材,传播者只选择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群的视角切入乡村生活,并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在特定的传播场域中得到“正反馈式”的激励。

三、农民媒介素养提升的有效路径

农民媒介素养的提升无法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指向性的循序渐进的实践过程。在数字化背景下,探索农民媒介素养提升的有效路径,还应该特别关注追求个人价值和实现社会价值的统一性,在内容、目标上发挥数字赋能乡村文化的综合价值。

(一) 关注新媒体技术发展,提高农民网络信息解读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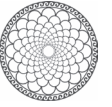
农民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解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下。传统媒介时代,农民所接受的信息是经过把关人层层筛选的信息,相对来说,信息是单一化的、可依赖的。信息化社会,互联网络的出现和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改变了农民信息获取的固有模式,网络不仅成为社会系统的神经,也是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除了信息获取之外,作为新时代的网络用户,农民还应当增强信息接触的主动性,不仅要利用信息平台学习农业科学知识,还要不断提升分辨和解读信息的能力。

(二) 大力倡导网络文明,提高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要把提高农民媒介素养纳入基层政府的管理体系,把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现代化治理高度融合起来,大力弘扬农耕文明,增强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向心力,帮助、引导农民在面对网络信息时能够明是非、辨善恶、知良莠。政府可通过议程设置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开阔农民媒介视野,破除“信息茧房”,增强农民信息选择的自主性和辨识性,避免产出和传播低俗及同质化的内容。农村文化机构可以依靠自身优势,通过建设文化设施、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培养农民文化素质、人文修养,如农家书屋可通过增加图书品种、类别,农村数字图书馆可通过阅读终端技术改造,等等,在帮助农民提升媒介素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三) 加大“网络扶智”力度,实现乡村文化脱贫与文化振兴的有效衔接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应突出“网络扶智”的助力作用,实现乡村文化脱贫与文化振兴的有效衔接^[3]。一方面,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农村数字化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特别是要扩大农村地区5G基站数量、增强网络信号的传送速度等,为“网络扶智”提供基础性保障。另一方面,为使“网络扶智”落到实处,在大力扶持农村电商经济的同时,相关政府机构也要加大对乡村文化传播的政策扶持力度,提高农民致力于乡村文化传播的主动性、积极性。各种数字平台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快乡村经济、乡土文化资源的数字转化效率,精准服务于农民需求,为挖掘乡土资源、传播乡土文化、深耕农业市场提供全方位支持。数字农家书屋建设是新时代赋予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加快“网络扶智”的重要举措,应积极拓展乡村文化创意空间,搭建数字化的乡村文化创意平台,探索多模态的乡村文化建设途径,使农家书屋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渠道^[4]。



（四）着眼乡村振兴“铸魂”工程，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乡村网络课堂建设

作为打通媒体融合“最后一公里”的新型主流媒体，县级融媒体能够满足新媒体时代农民受众的信息需求，承载着为乡村振兴“铸魂”的重要使命，是提高农民媒介素养的有效平台。依托县级融媒体，各类网络课堂也已进入农民的生产生活，成为提高农民媒介素养的良好途径。首先，网络课堂可以将乡村文化内容模块化，通过各级乡镇的信息服务站实现层级扩散，还可借助乡村意见领袖的力量扩大辐射面。其次，网络课堂可以通过权重化的科学计算完成信息推送，并根据用户画像满足农民的信息需求，帮助农民更全面地了解涉农信息，让农民的网络生活更加便捷。最后，网络课堂可以因地制宜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并根据区域特色和风俗习惯指导农民对外传播乡村文明。只有经过系统的媒介素养培训，农民才能提高对信息的辨识、制作和发布水平，更好地提升信息传播的可信度。

（五）加强农民的代际沟通，推行家庭“数字反哺”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媒介素养在改善农村家庭文化氛围、重塑乡村社会结构方面更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农村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是老年人的比例居高不下，信息技术的复杂万变与乡村人口的老齡化形成巨大反差，乡村文化振兴不能让老年人离场，应该鼓励晚辈通过数字反哺的方式，教会他们逐步掌握智能设备的操作和使用方法，完成媒介化身份的转变，实现家庭场域学习系统的动态平衡。除此之外，乡村老年社群的互助学习，也能帮助老年农民养成良好的新媒介使用习惯，并因此构建起一个沟通便捷、交流有效的信息渠道，使数字对乡村文化振兴的赋能覆盖至农村所有人群。

四、结语

农民媒介素养的提高，关乎农村文化的建

设与推广，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针对新形势下农民媒介素养缺失的种种表征，通过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倡导网络文明、加大“网络扶智”力度、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推行家庭“数字反哺”等，可以极大地促进农民媒介素养的有效提升。基层乡村文化服务也应以提升农民媒介素养为抓手，大力培育一批有文化、有素质的新时代新农民队伍，使其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并能通过新媒体平台合理表达农民诉求、完善舆论监督平台、提高乡村群体文化的向心力，把每一个农民主体都纳入乡村振兴建设的队伍中来，实现乡村文化的共建共治共享^[5]。这无论对于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还是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无疑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 [1] 强月新，孙志鹏. 互动仪式链理论范式下官员直播带货现象分析. 编辑之友，2020（10）.
- [2] 马树同.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土文化传承略论. 延边党校学报，2020（3）.
- [3] 韩美群. 找准乡村文化脱贫与文化振兴的衔接点. 光明日报，2021-06-24.
- [4] 尹章池，张璐瑶. 农家书屋振兴乡村文化的新使命、延伸功能和创新形式. 中国编辑，2020（8）.
- [5] 曾润喜，莫敏丽. 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短视频+”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中国编辑，2021（6）.

[本文系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出版业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魏然]